

一個挺梁華人的思考:梁彼得案“反轉”背後

3月23日,駐紐約布魯克林的聯邦地區檢察官辦公室發表聲明,稱不尋求讓開槍導致一名無辜非裔青年身亡的前紐約華裔警員梁彼得入獄。在關注梁彼得案的很多華人眼中,梁彼得案反轉,是華裔美國人上街維權、抗爭的結果,是集體抗議的空前勝利。但在美國也有不同聲音。有分析人士認為,華人上街並非是導致梁彼得獲得較輕量刑的直接原因。甚至有學者認為,檢察官的量刑建議體現了美國司法的公正,與華人維權無關。美國新澤西華人金先生1990年代移民美國,他參與了“220挺梁遊行”。在他看來,雖然梁彼得可能並非華人起來抗爭的“理想的主角或案例”,但多年來華人已經當夠了“沉默的模範族裔”,不能再等。近日金先生為全球眼(微信號:globalwatch2015)撰文,分享了他對梁彼得案“反轉”的觀察。

紐約時間周二傍晚,上個月全美國30多個城市好幾萬華人的抗議示威終於有了結果:紐約Brooklyn地區檢察官對新聞媒體宣佈,4月份就紐約市華裔警員Peter Liang 誤殺黑人一案判刑時,他將不會要求法官判處Peter Liang 監禁,而會只要求5年緩刑6個月軟禁,外加500小時的社區服務。消息傳來,參加220全美大示威的華人們長長地舒了一口氣。

事件始於2014年。入行不久的兩名紐約警察半夜在紐約最危險的貧民大樓之一“粉紅樓”(The Pink House)巡邏。走在前面的華裔警察Peter Liang 舉着手槍和手電筒,剛剛頂開門進入全樓最危險的部位——樓梯井,黑暗中他突然聽到“咣”一聲巨響,驚嚇之中他抽動扳機,子彈擊中牆面後反彈,射入下面一層剛剛推門進入樓梯間的居民Gurley的胸部,Gurley傷重死亡。

美國每年有上千人因各種原因死于警察槍下。雖然被警察打死的白人比黑人多,但是按照人口比例來算,美國黑人(佔美國總人口的12%)比白人(63%)被警察打死的可能性高出3.5倍(《紐約時報》2015年9月4日報道)。近兩三年美國發生了好幾樁白人警察在令人生疑的情況下打死黑人的事件,在媒體廣泛報道下,全美國黑人社區爆發大規模抗議,他們的口號是:“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

按照美國的司法程序,地區檢察官認為應該起訴誰,必須先向法院陪審團(grand jury)提出告訴。大陪審團按照簡單多數原則投票,如果決定“應該提出控罪”(indictment),地區檢察官就向法院起訴,法院審理後如果陪審團(jury)認定罪名成立,檢察官提出量刑建議,法官最後裁定判刑。

這幾個警察在可疑情況下打死人的事件中,白人警察大多數未被判刑,這在黑人社區激起抗議浪潮。到了今年Peter Liang一案被大陪審團裁定“理應提起刑事訴訟”時,該案幾乎成為緊繃的警察—黑人社區關係的“導火索”,全美國的媒體都在高度關注這個案子的審理。在此背景下,當陪審團2月11日宣佈所控的“過

失殺人”等多項罪名全部成立,也即最高可判15年監禁時,美國各地很多華人都憤怒了:前面那些白人警察都沒坐牢,這次僅僅因為Peter Liang是華裔警察,明擺著是一場悲劇性的事故,卻偏偏要他來做替罪羊?

各地的華人藉助Facebook,尤其是微信,經過僅僅一周的組織,2月20日從紐約到洛杉磯,從休斯頓到北部小城Boise,30多個城市,數萬華人同時舉行的大規模示威,單在紐約市就有不下2萬人參加了抗議集會。在全美範圍內幾十個地點同時舉行這樣大規模的示威,是美國華人歷史上的首次。包括《紐約時報》、CNN在內的美國主流媒體都作了報道。

雖然早在1840年代華人就逐漸在曼哈頓下城聚居,開始形成紐約唐人街,但是在唐人街頭一百多年的歷史中,華人基於“各人自掃門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的生存原則,一直默默地埋頭于自己的生計,生意,大多數人根本就不投票,更談不上積極參與美國的政治活動。抱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古訓,即便受到了其他族裔的欺負,也往往忍氣吞聲。但是“該來的躲不掉”,到了1980年代,麻煩終於找上了門。

紐約在二戰後的幾十年里,雖然經濟發展很快,但是犯罪率也直線攀升。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人稱“大蘋果”的紐約已經成了名副其實的爛蘋果,監獄人滿為患,急需新建新的大監獄。但誰也不願意政府把監獄建在自己家附近:不僅不願意覺得不安全,而且房價極有可能會因此下跌。吵了一圈之後,市政府拍板:就造在唐人街旁邊吧。這下華裔的火氣終於爆發了:“憑什麼別人不要的東西,造到我們家門口來?美國不是講民主講言論自由嗎?找議員,找市長討說法去!”

當時的紐約市長是Ed Koch,他兩手一攤,就簡單一句話,話糙理不糙:“你不投票,就不作數”(You don't vote, you don't count)。在他看來,政客要聽選民的。華人選民不參選,不出聲、不投票,算哪門子“選民”?我一個政客、一個民選官員憑什麼要聽你的?

今天,在紐約唐人街最主要的街道Canal Street(堅尼街),在Centre Street路口向南拐,行約百米,就會看到一座巨大監獄,四周有很多辦理保釋金貸款的小舖,警車、囚車來來往往。這個大監獄的建成,尤其是Ed Koch的話,深深地刺激了紐約唐人街內外的華人。從那時開始,紐約華人參政的越來越多,各種社區的維權組織、非盈利的社區法律顧問中心也逐漸設立起來。多名華人當選了紐約市議員,前幾年已經有華人當選了紐約市政府里僅次于市長和市議會議長的財務總監。

死者格利的家屬和非洲裔社區認為梁彼得罪有應得。

但這次要在全美舉行示威,為Peter Liang伸張正義,華人圈也存在不同看法:

有一種觀點認為,雖然Peter Liang打死人事出有因,是事故,但畢竟是致死無辜者。更關

鍵的,作為一個理當以保護民眾為己任的警察,他在知道自己開槍傷人後,不是第一時間救人,叫救護車,而是在長達20來分鐘的時間里不斷地念叨着“壞了壞了,這下我完了”,為自己的前途,可能會受到的處罰擔心。就憑這一條,他也理應受到法律制裁。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支持Peter Liang的示威,簡直就是“白人警察打死黑人沒事,我們華人警察打死黑人也該沒事”邏輯的翻版,必定激起其他族裔,尤其是黑人的極大反感。將心比心,在同樣情況下,一名黑人警察打死了一名華人,難道我們也會去為了這個黑人警察去示威嗎?

同時,部分支持Peter Liang的華人還認為,被打死的Gurley簡直是黑人下層犯罪群體中的一個典型:他是非婚生,跟母親長大,自己也育有非婚生孩子,有20多次被捕記錄,出事前剛刑滿釋放不久,販毒為生,與女友在“粉色樓”里同居。所以被Peter Liang打死,也算不上是美國社會的損失。

在我看來,這些看法都站不住腳:不可否認,Peter Liang遇事慌張,毫無主見,分不清輕重緩急,缺乏執法人員理應具備的水準。但是他沒有施救,一定程度上也是因為紐約警官學校里對人工呼吸等救助培訓流于形式。很多警察包括Peter Liang根本不知道正確的救助方法。這在法庭上也是有多名證人證實了的。作為華人社區選來為自己的族裔維權的抗爭主角,他不是一個完美的人選。但問題是:如果你們等到有一個大家普遍認為“相當理想的主角或案例”再去抗爭的話,你打算等到什麼時候?多年來華人已經當夠了“沉默的模範族裔”,不能再等了!而且,黑人社區也知道Gurley的根底,但他們誰也沒說“哦,是這個人被打死了?不值得我去為他示威”。恰恰相反,黑人社區為他群起抗爭:他在那樣的意外情況下被打死,根本就不存在“他究竟是聖人還是流氓”的問題,你只能認定他是一個無辜的受害者。

我本人完全贊成“這一事件中Gurley是一個完全無辜的受害者”的觀點。但是也正由於同樣的道理,華人的示威行動,也是必須的。Peter Liang絕非完人,他有大錯,但是因事故而意外傷人,不該受到嚴厲制裁,更不該成為白人警察暴力行為的替罪羊。在美國這樣的民主社會中,各族裔必須毫不遲疑地為自己的群體利益發聲。套用當年紐約市長Ed Koch的話:你不發聲,就不作數。

不錯,這次示威可能對華人與黑人社區的關係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有些黑人會把這次華人示威看作是“華人也想跟白人一樣,殺了黑人不用負責”。但是不能不看到:220紐約華裔社區的示威行動一開始,就是為受害者Gurley默哀,並始終強調這次示威抗議的是司法體制本身的不公正,而非針對黑人或任何其他族裔。同時,這樣大規模的示威,不僅讓很多常在黑人和拉美裔聚居區里送外賣、時常被打被搶的

華人外賣郎也出了口氣,也讓美國社會多少改變一下“華人老實好欺負”的老眼光。

這從紐約警察工會的前後反應的變化也可看出些端倪:警察工會一開始是表態支持Peter Liang的,但後來有一陣幾乎銷聲匿迹了,似乎想撇清干係,直到華人社區開始大規模發聲支持Peter Liang,並質疑警察工會的做法之後,他們才又露面,並安排2名警察到庭,在Peter Liang的被告席後面為他“站台撐腰”。

美國合法、非法的槍支幾乎與人口一樣多。後果之一,就是警察成為美國風險最高的職業之一,尤其是象紐約這樣大城市的警察,每年都有多人殉職。而政客往往為了討好選民,不講原則,動輒指責警察的種種不是。Peter Liang和其它幾件紐約市的“警察打死了人”事件發生後,紐約市長Bill de Blasio一再指責警察濫用暴力,紐約警察心里窩火,士氣低落,開始消極怠工,罰單開得少了,出勤反應慢了,犯罪率自然就上昇了。甚至220紐約示威結束後,有剛參加完遊行的華人學生進入地鐵站後在東張西望找方向,聽到附近有警察招呼他們過去。平時以“抓逃票”為本份的警察,這時候卻一把打開推開了檢票閘口旁的應急門,朝學生們打了個手勢:進去吧。

梁彼得被陪審團裁定犯有重罪後,檢察官湯普森接受媒體採訪,他認為梁彼得有可能最後獲緩刑。

起訴Peter Liang的地區檢察官湯普森是個黑人,主要是依靠區內大量的黑人選票才當選為檢察官。此案中他一開始很顯然要為自己在黑人社區內加分,一再高調嚴詞指控Peter Liang,要求陪審團給Peter Liang定下重罪。可現在他卻突然態度大轉變,不顧黑人社區的激烈反對。這不能不讓人感到:華人抗議有一定影響。但是,很可能抗議只是因素之一。各個政府部門、警察局、警察工會、政客們、檢察官們之間幕後恐怕還有相當大的角力和相互影響:畢竟警察一怠工、犯罪率一上去,這些人誰也跑不了,都會被紐約選民的罵。所以現在黑人社區抗議的最高潮早已經過去,大家該收拾攤子“往前看”了,平衡好各方面的利益關係,讓警察搞好治安、求得社會利益和各方利益的最大化,才是根本。

當然,我絕不是說“大家必須無論如何都支持警察的工作”,因為美國警察的權力非常大,如果不受到各方的監督和轄制,絕對不行。

丘吉爾曾說:“若不是有歷史上人類嘗試過的種種制度給它墊底的話,民主制堪稱是最糟糕的政府體制”。在美國,各個族裔之間、政府與選民之間、警察與各個社區和司法體系之間等形形色色的關係和博弈,時刻都在繼續。令華人高興的事:我們終於從“沉默的模範族裔”的魔咒下跳出來,在全美範圍內為自己族群的利益怒吼了一把,並嘗到了一絲成功的甘甜。願這重要的一小步,幫助我們永遠記住:你不發聲,就不作數。—网络文章

3月26日,國民黨黨主席補選結束,洪秀柱成功當選。這次選舉是在國民黨2016大選遭遇潰敗的大背景下,可以備受島內外關注。大選失利後,國民黨士氣低落,朱立倫辭職後,名不見經傳的黃敏惠出任黨主席,國民黨實際上處在“群龍無首”的狀態。因而,現在的國民黨比任何時候都需要一個有強大領導力的黨首,以避免黨內分裂、被選民邊緣化,這也是國民黨改革和轉型、做好在野黨以及未來再出發的前提。朱立倫宣佈辭職後,在藍營選民怨氣瀰漫、黨內無人接手“爛攤子”的情況下,“小辣椒”洪秀柱隨即挺身而出,第一個宣佈參選黨主席,這被認為是勇氣可嘉。而這次洪秀柱在四位候選人脫穎而出,也並不具有太大懸念。洪秀柱26日成功當選國民黨新一任黨主席。

但是,對於洪秀柱而言,如果說競選黨主席是穩操勝券的話,那么在正式成為黨主席後,如何應對黨內外複雜的社會環境和政治局面,才是真正要面臨的挑戰。對於洪秀柱率領下的國民黨來說,既要充分認識到2016大選失敗後可能產生的各種後果的嚴重性,同時,更重要的是,若不想被選民們永久拋棄、砸掉這塊“百年招牌”,並以求重整旗鼓將來東山再起,恢復昔日榮光,就必須對2016大選和國民黨本身進行徹底的反省並做出如下改變。

第一,重建國民黨的政治文化。國民黨一直被認為是一個精英政黨,七十年前就是因為過分的精英化,不能看到社會民意發展走向,失去民心,被共產黨的“工農革命”趕出了大陸。在今大的大選中,國民黨也可以說正是被島內的“公民運動”趕下了台。

正如此前所流行的看法,2016總統大選競選過程中蔡英文的人氣一直大幅領先於朱立倫,並不是因為蔡英文表現得有多么的超群絕倫,而是執政的國民黨這些年表現得實在太差,以致于島內人心思變。國民黨執政8年,雖在兩岸關係等領域取得不少成績,但執政包袱顯然更重。尤其是這些年台灣悶悶的經濟局面沒有明顯改善,經濟增長十分緩慢,外貿波動大,物價上漲,薪資倒退,失業率居高不下,貧富差距拉大,

民衆生活鬱悶,不滿情緒高漲,“公民運動”風起雲湧。2013年的洪仲丘案引發20余萬民衆自發走上街頭,2014年爆發“太陽花學運”,2015年又爆發“反課綱學運”。不停的社會運動,使得國民黨的形象和支持率遭受重創,執政滿意度不斷創下新低。

國民黨是一個精英權力和利益共享式結構

洪秀柱要直面國民黨的三大挑戰

的政黨,近年來還被認為是已純粹淪為了“台商”利益的代言人。國民黨執政8年,兩岸經貿往來成果頗豐,但獲利主體卻是以台商為代表的精英群體,普通中下層民衆並未從中得多太多實惠,這正是“公民運動”不斷湧現的一大誘因。從“工農革命”到“公民運動”,這啓示國民黨,必須對幾十年來自己所走的精英路線的政治結構和文化理念做出調整,使自已成為大多數公民利益的代言人,否則,便將永遠得不到民心。

第二,國民黨必須改變內斗的局面,重新團結起來。派系分立與內斗似乎是國民黨與生俱來的毛病。在2016大選中,從“換柱”風波到難以提出有公信力的不分區立委名單,國民黨就給人留下了“派系爭鬥不止”的印象,這也極大地拖累了國民黨的選情。一直以來的內部分裂不團結,實是國民黨敗選的一個致命原因。

衆所周知,國民黨高層現在已出現馬英九、朱立倫、吳敦義、王金平“四駕馬車”式的多頭政治格局,這使得國民黨內部派系林立,難以協調,面臨危機卻始終沒有危機意識。王金平自始至終不與馬英九合作,“馬王政爭”震撼黨內外至今創傷未愈。朱立倫接任黨主席後,試圖與馬英九政治切割。原來有可能成為下屆總統候選人

的吳敦義,與朱立倫之間關係也極為微妙。而在政治立場上,馬英九朱立倫被認為是中間派,王金平等是本土派,洪秀柱被認為是黨內“深藍”勢力的代表。這些都使得黨內大佬們貌合神離。而後的臨陣“換柱”和不分區立委名單的出爐正是建立在這種複雜局勢之上。

顯然,如果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國民黨將永



無寧日。反觀蔡英文,之所以能夠操盤選舉屢戰屢勝,就在于她不但能夠團結民進黨內部,將民進黨打造成具有高度凝聚力的政黨,還能夠整合泛綠各派系山頭,從而使綠營充滿戰鬥力。所以,對於即將成為在野黨的國民黨來說,要在未來實現翻盤,就必須改變以往“窩里斗”的局麵,團結起來一致對外。

第三,國民黨須重新認識台灣。當下,台灣的公民政治結構正在發生劇烈變化,這迫使國民黨必須注意島內民意的變化走向,尤其是要學會和年輕人溝通。

正如台灣民調專家、智慧交易所執行長洪耀南稱,台灣政治陣營一向是以藍綠相分別,雖然2008年泛藍實力達到頂峰,馬英九以得票率58.4%的優勢贏得大選,但也是從那時開始,藍綠基本盤逐漸發生根本性的變化,而這被國民黨所忽視。這些年來,泛藍選民不斷流失,許多新生代首投族都加入了泛綠的陣營。這八年中,國民黨歷經2009年縣市長選舉,2010年“五都”市長選舉,2012年馬英九以51.6%的微弱優勢險勝,2014年“九合一”選舉只剩下40.7%,七年後,朱立倫得票率更跌至31%。這些所揭示的正是藍綠陣營實力消長變化的體現。

也正如此前《多維CN》第三期文章《英倫二戰台灣究竟鹿死誰手?》中所言,藍營崩盤式的敗選,也不能完全歸咎於馬英九執政崩潰、國民黨內斗,以年輕一代為主要構成的第三勢力白色力量崛起也是一大主因。在2016立委選舉中,以年輕世代為主體的“時代力量”能夠獲得5席,超越僅獲3席的親民黨成為立法院第三大黨,說明新世代勢力已成為一支不可忽視的重要政治力量。而民進黨蔡英文能夠獲勝,就在於民進黨高層不僅實現了新老交替,而且能夠掌握主流民意的走向,順勢與第三勢力結盟,作出了正確的政治判斷。之前蔡英文推出的五大政綱中,第一條就是“實踐世代正義”,這對於年輕新生代力量是具有吸引力的。

反觀國民黨,不僅高層面臨人才斷層,黨員隊伍也全面老化,後繼乏人,而且與民意嚴重脫節,近年來一直延續政黨對決、藍綠對抗的老路,沒有考慮到新生代勢力的崛起,不會與年輕人溝通,就必然會被越來越多上場的年輕一代所衝擊,像“太陽花學運”和“反課綱運動”都是典型表現。蔡英文此前曾信心滿滿的稱可以“最會溝通的政府”,這也是國民黨的最大罩門。所以,重新認識台灣政治社會結構和民意變化,加強與年輕人的溝通,團結新世代力量必須是國民黨此後工作的重中之重。

總而言之,對於即將成為在野黨的國民黨及其新任黨主席洪秀柱來說,除要正視劣勢和不足之外,也要認清自己的優勢,畢竟自身還是一個歷史悠久、有著相當實力和基礎的政黨,而且目前來說還是最大的在野黨,而作為在野黨依然還有很多事要做。尤其是在剛過去的國民黨8年執政時期,兩岸和平發展成果顯著,那么在民進黨上台可能會為兩岸關係帶來不確定因素的情況下,在協調兩岸關係方面本就不可或缺的國民黨還可以扮演更關鍵的角色。而且,如果國民黨能夠深刻吸取此次敗選教訓,對黨內外各種挑戰作出有效應對,與時俱進,改弦更張,他日東山再起、重奪執政大權就不是沒有希望。